

高增杰 著

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

——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中国和平出版社

C9153

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

——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高增杰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7年4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论述日本实行“开国进取”政策和积极摄取西方文化要素，取得近代成功的过程，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及两种文化融合的规律。通过诸如削价拍卖、歌星沉浮、夫妻礼仪及违心购买汽车等日本人现代生活实例，分析日本近代价值观念和文化结构等方面的特色与变化。

作者多次赴日本考察，曾任日本国立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本书材料丰富、文笔轻松、富于趣味，是建国以来第一部论述日本近代文化的著作。本书适合企事业单位干部、青年师生阅读。

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

——谈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高增杰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字数：125千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3481·065 定价：1.55元

国际书号：ISBN7-80037-006-2/C·1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日本近代文化的起点——“文明开化”	(5)
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5)
二 文化接触的序幕——火药枪与天主教的传入	(7)
三 西方文化是一把双刃剑	(14)
1. 西方文化的巨大威力	(14)
2. 文化冲突	(19)
四 “文明开化”——吸收西方文化的决策	(24)
1. 超越心理障碍	(24)
2. 吸收西方文化要素	(29)
五 开放和选择摄取是日本近代成功的重要条件	(33)
第二章 群体与个体	(39)
一 夫妻礼仪差异的启示	(39)
二 日本文化的相位	(40)
1. 文化差异	(40)
2. 重视个体——西方文化传统模式	(41)
3. 重视群体——日本文化传统特征	(45)
4. 两种不同相位的文化差异	(50)
三 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	(55)
1. 群体特征的三项行为原则	(55)
2. 群体特征的社会意义	(61)
四 个体活力增强	(66)
1. “奇兵队”的意义	(66)
2. 经济发展与西方文化刺激	(67)
3. 个体因素增长	(69)

五 当代日本文化中的群体与个体·····	(76)
1. 现代日本社会中的个体·····	(76)
2. 群体特征的继承·····	(82)
3. 群体与个体的均衡·····	(90)
第三章 协调与竞争·····	(97)
一 秋叶原的削价拍卖·····	(97)
二 协调——传统行为模式·····	(98)
1. 协调是权威与类比的产物·····	(98)
2. 权威性格的制约作用·····	(99)
3. 类比心理与类比行动·····	(111)
4. 协调行为及其意义·····	(123)
三 竞争·····	(125)
1. 竞争原则与竞争行为·····	(125)
2. 日本传统文化抑制竞争·····	(130)
3. 激发活力的需要——吸收竞争原则·····	(134)
四 竞争原则“日本化”——协调与竞争的结合·····	(138)
1. 协调与竞争的冲突·····	(138)
2. 群体间竞争·····	(141)
3. 协调与目标趋向型竞争结合——群体内类 比竞争·····	(146)
4. 近代日本式竞争的基本特征·····	(152)
第四章 日本近代文化的双重结构·····	(159)
一 “和”“洋”并举·····	(159)
二 两种文化并存——横向双重结构·····	(160)
三 不同的文化层次——纵向双重结构·····	(164)
四 向单一结构过渡·····	(169)
结束语·····	(176)

导 言

日本位于东方边陲，自古以来接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传统文化。直至上一世纪中叶，它还古色苍然，沉睡在“锁国”的梦幻之中。但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短短一个世纪里，日本已经崛起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在一些主要方面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近代以来，日本近代化的步伐急骤而迅速，仅用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各国花费二、三百年，甚至四百年走过的路程。这种人称“奇迹”的发展，原因何在？究其奥秘，除其它因素以外，近代以来日本实行“开国进取”政策，促使传统化与西方文化不断融合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六十年代以来，日本近代取得的成功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在过去藩镇割据的岛国上，日本民族经过艰苦努力，建成了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初期的焦土废墟上，他们力挽狂澜，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今天，整个日本列岛上高楼大厦冲破云霄，工业设施密集成群，高速列车风驰电闪，现代通信四通八达。它生产出的印有“日本制造”标记的各类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

① 明治维新：1868年，日本封建统治政权幕府被推翻，新政权宣告成立。其后，新政权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它构成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起点，史称“明治维新”。

德、法、英等发达欧洲国家，仅次于美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综观日本工业发展的水平，传统的造船工业、汽车工业早已位列榜首。高科技领域里，新技术和新材料，不断取得巨大进展。“京都陶瓷”已经成为新型材料工业的宠儿。大型电子计算机接连问世，小型电脑开始进入普通家庭，机器人也已在许多日本企业安家落户。在去年举办的筑波科学博览会上，机器人为人们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和参观者握手言欢，还舒展广袖，翩翩起舞……

对于百年来日本近代化的迅速发展和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许多国家惊叹不已，称之为“奇迹”。出于种种不同的需要，许多人纷纷探讨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尤其对于造成这种“奇迹”的经济因素，做过不少调查和研究，探索经济结构、政策和措施方面的诀窍，力求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因素。

然而日本近代的巨大变化首先是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突飞猛进，而且包含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社会生活面貌的改变和价值观念的进步，它是一种涉及诸多领域的社会总体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正如艾尔弗雷德·克罗伯^①所说，社会现象的发生与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应该应用文化理论对社会现象变化的部分进行分析。他主张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视为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进行探讨。其它一些人都提出类似的观点。例如，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经济咨询小组曾提出一份报告，认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日本文化的作用，指出“深入分析日本文化，可以发现它的基本特色渗

^① 艾尔弗雷德·克罗伯 (Krober, Alfred Louis 1876.6.11~1961.10.5)，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透于经济制度之中，是活的经济体系”。总之，从比较广阔的视野来看，日本近代以来的变化和发展也就是它整个文化体系的发展变化。

日本和欧美各国的学者近年来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从文化的角度做过一些剖析。但是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各有偏颇。

日本的一些学者探讨近代化过程中文化因素时大多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认为日本文化有其传统特色，是取得日本成功的基础。当然，这些看法主要是出自他们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但是单纯强调传统文化的特殊之处，忽略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变化及其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重要因素，那就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嫌了。西方学者对日本文化的探讨大都源于自身的需要，寻找它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因素，希望通过两种文化比较所得差异，为西方各国摆脱困境开出处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从头开始”，指出日本文化的长处，意在挽回英国衰落的颓势。美国学者着眼于日本文化在经营制度上的特点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社会问题，提高生产效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美国作家埃兹拉·沃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明确提出要美国把目光转向日本，借鉴日本社会中的许多独特文化因素，号召“向东方学习”。基于这一出发点，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主要集中于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表面现象上的一些差异。

实际上，日本近代文化体系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十分杂复的现象。它首先是前近代日本文化的直接继承，同时又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延续。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日本成功的重

要原因。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锁国”和固守原有文化，非但不可能迅速实现突飞猛进，反而因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而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日本民族权衡利弊，毅然做出了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重大抉择，实行“文明开化”，努力摄取东渐而来的西方文化，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它构成了日本近代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看来，日本近代的发展主要来源于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传统文化积极而有选择地摄取西方文化的营养，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则融入日本传统文化体系，经过日本化，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扎根生息。日本近代文化体系就是两种文化经过冲突和适应达到融合的产物。日本近代的成功正是两种文化融合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由于这种原因，研究和探讨日本近代成功的奥秘，主要力点应该在于剖析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真正挖掘日本近代化迅速进展的原因。这种研究首先要涉及到两种文化在各种不同相位的差异和日本传统文化得以继承的内在原因，横跨宗教、文学艺术、语言等各种文化现象，而且要集中分析文化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化。诸如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过程中群体与个体的矛盾与对立，协调与竞争的冲突与结合，都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化首先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本书就是力图从这样的角度探讨日本近代以来两种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几个主要侧面，选取文化体系中较为重要的行为模式，分析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它与西方文化形成的和谐状态，探索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奥秘，描述东方国家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特点，并且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章

日本近代文化的起点

——“文明开化”

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一八六八年二月，日本京都皇宫内一间日本式房间里。在昏暗的光线照射下，几个人正襟危坐，正在进行一次决定日本近代命运的外交谈判。主座上坐着一个年仅十五岁的青年，身着宽松长袍，博带峨冠。他就是刚刚受到一群下级武士拥戴而被推到日本近代历史舞台前沿的明治天皇睦仁。另一面坐着法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驻日本的公使，正在静静地倾听这个年轻的明治新政府首脑谈话。明治天皇叙述了新政府组成的情况，接着郑重地表示断然放弃德川幕府过去执行的锁国政策，立志开国进取，革除旧习，广求知识于世界各国。这次会见很快结束了，但它却影响其后日本的命运，象征着日本近代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吸取西方文化，努力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起跑点。

“文明开化”是日本明治时期，举国一致的目标和政府的重要政策。它的实质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借鉴，积极摄取西方文化。明治政府设立了矿山、缫丝等为数众多的近代厂矿，建立了电话、道路等近代通信交通设施，学习和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普及小学教育，并且改革政府体制，

积极地将西方文化及其成果移植过来。同时，在群众生活的层次上，西服、短发广为流行，牛排、西餐十分时髦，社会风尚也模仿西方。它虽然具有肤浅效仿的弊病，但是日本结束了“锁国”，面对现实，勇敢地实行开国，从根本方针上说，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起点。

东方国家日本决定在近代开端结束闭锁国门的政策而接受西方文化，实行“文明开化”，经历过一个认识过程。他们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西方文化的威力，并且经过认真思索，最后做出了这一重大决策。

日本是东方海上岛国，自古以来摄取中国文化，而且还通过中国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经过积淀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十九世纪中叶，虽然日本还处在幕藩体制的状态，但广大群众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息，有着稳定的伦理习惯和道德规范，构成了东方色彩的文化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此以前，它很少接触到西方文化。直至数百年前，它还基本上不了解大洋彼岸的西方文化。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地的联系日渐密切，文化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东方来说，西方文化伴随着传教士、贸易商人和军事力量陆续飘洋而至，既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也给日本民族的生存带来了威胁。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提督培里率领舰队驶进东京湾，强行要求通商，叩击东方国家日本的国门。自此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向日本，开始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冲突和融汇的过程。

西方文化涌来，给日本民族造成了极大震动。他们亲眼

目睹和亲身感受到西方文化中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逐步认识到这是振兴和发展民族的“宝物”。但是同时，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文化冲突使封建统治者感到震惊，地区差异引起的文化质差又使多数日本人一时难以适应。西方文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传统文化体系。面对这严峻的抉择，日本民族何去何从？十九世纪中叶，这个问题曾经是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关注的课题。出自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利益，众说纷纭，行动各异。经历过不太长时间的思考和摸索，日本民族终于权衡利弊，做出了重要的抉择：开国进取，“文明开化”，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此在既存文化体系中增加新鲜血液，争取民族的振兴和发展。

明治天皇会见西方各国公使宣布开国进取和“文明开化”，构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一页。从此，日本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一环，揭开了日本近代摄取外来文化促成近代化的新的一页。

二、文化接触的序幕

——火药枪与天主教的传入

西方文化最初直接传播到日本，大约发生在四百多年前，而这一幕从一开始就极富有戏剧性。

一五四三年，日本南端种子岛附近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大帆船。这艘船，船身高大，上面矗立着数根高大的桅竿，渐渐地驶近岸边。当地的日本人看到船上有些人碧眼金发，诧异万分。通过与同船的东洋人笔谈，他们得知这些人属于“西南蛮种的贾胡”——即“南蛮人”，实际就是葡萄牙人。接触中，日本人看到“南蛮人”携带的火药枪十分精巧，

威力甚大，惊叹不已，于是用当地土产换了两支，并且要这些“南蛮人”把这种枪支的使用方法和火药调配的方法传授下来。这是西方文化首次传播到日本。它的直接结果就是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之一——火药枪传至日本，并且迅速地传布，成为其后数百年内日本战斗中使用的重要武器。

一五四九年，西班牙传教士法郎士·方济格和他的伙伴在一个名叫弥次朗的日本人带领下，乘着一叶扁舟，经过长时间海上颠簸来到日本南部鹿儿岛。这位身穿道袍的天主教徒在鹿儿岛登陆以后，拜见了当地大名^①岛津贵久，陈述教义，并且要求准许传教。其后，他又到九州岛其他各地，分别拜见了几位大名，积极地传教，先后为一百余人施以洗礼，利用废弃的寺院举行宗教仪式，向当地日本人宣讲天主的福音，把西方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天主教传播到日本。从此，日本人中有一些人改宗信仰天主，成为“吉利支丹”——日本的天主教徒。

这样，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以火药枪为象征的西方文化物质成果和天主教为主体的观念形态文化开始进入到日本这个东方文化的国家。接着，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贸易商船也接踵而至，揭开了西方文化直接进入日本文化体系的序幕。

文化体系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文化复合的整体。它包括许多不同的次层，内涵十分丰富广阔。按照文化学的一般划分，它首先可以分为外显部分和内隐部分。前者主要指包含文化要素的物质载体，诸如各类生产工具、机械、建筑物以及武器等均属此类。后者则指以人的精神世界为依托的各种

^① 大名：日本封建社会末期，在幕府统治下，全国诸侯林立，称为“藩”，藩主亦称大名。

文化现象,包括科学、知识、观念、道德及习俗,尤以信仰、宗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文化发展运动的规律来看,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外显部分具有外在形态,人们比较容易认识和接受,易于传播,速度迅速且范围广泛,而内隐部分则因为与人的心理素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经由各民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相对稳定,因此它在传播时不易为异质文化接受,往往要经历比较复杂的冲突和融汇过程。在西方文化传入日本的早期,它的运动形式也完全遵从这一规律。

以火药枪为开端陆续传播而来的西方技术,尤其是各种物质实体^①以十分迅速的速度在日本传播开来,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

种子岛上留下的两支火药枪,很快就为日本技术精湛的铁匠解剖仿制,并且逐渐传布开来,批量生产,成为当时的统治者——大名们装备自己部队的重要武器。日本人干脆称火药枪为“种子岛枪”,把它视作具有强大威力的先进装备。日本的统治者——幕府和各藩的首领还竞相开展海上贸易,从西方商人手里购买各种弹药和枪支。及至后来,南方各藩还效法西方建立工厂,制造武器装备,幕府也在横须贺兴建了造船厂。

与这些具体的技术成果相联系,自然科学很自然地引起日本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他们先后通过荷兰人了解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科医学,学习西方历法,绘制地图,以至掌握西方建筑技术和试制发电机。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逐渐吸收西方文化,建立起“兰学”^②体系,并且逐渐扩展为

① 这些物质实体是文化的结晶,其中渗透着无形的文化要素,也是文化内隐部分的载体。

② 兰学:十七世纪,日本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文化主要通过来至日本的荷兰人,故有此称。

“洋学”。即使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也表现出一定热情。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重视“实学”，鼓励“兰学”的发展，甚至后来还专门成立了“藩书调所”^①，设立各种学科，研究和教授西方自然科学技术。

西方文化的物质载体——许多生活用品也陆续传入日本，并且渗入到日本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有些还成为日本普通群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帽子、裤子和斗篷得到相当普遍的使用，椅子和床这类洋式家具也开始闯入日本人的家庭，眼镜、钟表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至于烟草，则从此成为许多日本人的嗜好品。

与上述外显部分的文化要素不同，属于精神、观念部分的文化要素从传入日本之初就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最集中地表现为天主教传入日本之后的遭遇。

天主教的传入成为西方文化影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对日本文化中既存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一种潜在的冲突因素，再加上贸易和政治统治等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使它在传入日本后的经历十分曲折。

天主教进入到日本文化体系之初，曾经借助南方各地大名的力量。神甫和修士们一方面给一些大名宣讲教义，令其成为天主教徒，另一方面又得到大名的允许，在其领地内传教。虽然一些大名主要是出于发展贸易的目的成为教徒的，但大部分群众却大都是为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所吸引而皈依天主教的。仅经过三十年时间，南方各地已有十五万教徒，西日本和九州一带建起了二百多个教堂。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广

^① 藩书调所：即外国科学研究所之意。

泛地接触一般群众，在教堂里举办讲座，宣讲教义，出版《圣经》，还演出宗教剧，散发印有宗教故事的铜版画。这样，天主教一度曾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

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相当数量的群众，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天主教发展教徒直接以群众为对象，不像与上层统治者关系密切的佛教那样拥有威势，主要是传播教义，争取群众的好感。由于天主教完全从零开始，神甫们十分注意走到普通群众，尤其是妇女中间，从生活互助和疾病治疗等一些方面感化群众，树立天主教的形象，因此比较易于见到效果。

二是天主教教义中关于平等的思想原则对于普通群众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是天主教一时间得以在日本群众中站住脚根的根本原因。西方传教士传播天主教，主要目的在于进行思想侵略，但是正如鸦片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一样，天主教反而促成了日本群众思想上的激变。日本封建统治实行严格的身分制度，天主教却主张人间的一切都属于上帝创造，君臣、夫妇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它在教义实践中强调“爱”，倡导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地与邻人相爱”。这些说教虽然掩盖了宗教统治的实质，但在很大程度上富有欺骗性和诱惑力。特别是天主教的神甫们以教堂为依托，举行各种集会，宣扬信仰，强调妇女地位和一夫一妻制，极大地吸引了大量妇女和一般群众。而长期在严格身分制下生活的日本群众接受到关于上帝面前众人平等的教义，犹如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纷纷表示皈依。教堂印发各种宗教读物，传播《弥撒经》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吸引了不少人。这样，外国传教士数量日渐增多，还出现了不

少日本人的神甫和修士。据统计，到十七世纪初，日本各地教徒密布，多达七十余万。九州地区还组成了一个五十余人的少年使节团，乘船远渡重洋，奔赴罗马，拜见教皇。

但是，尽管天主教赢得了一些群众的信仰，但是这种属于西方文化的宗教却与日本传统文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它与日本文化在伦理观念上的明显差异，造成不少人在思想深处的动荡，并且存在着破坏日本固有秩序的威胁。本来，日本原始宗教属于一种多神教，而天主教的教义主张世界只有唯一绝对的上帝——天主。这种宗教体系上的矛盾很难简单地调和。此外，“平等”的观念虽然使人们感受到解脱压抑的新鲜感，但与日本当时业已形成的社会秩序，伦理观念，即家庭中的长幼序列，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显然形成明显的对立。这虽然使不少人感到开阔了思想，但更多的人却在思想深处存在抵触情绪。从总体上说，在西欧社会中，天主教的教义与社会结构互相匹配，共同构成社会体系，因此上帝面前众人平等的说教能够存在。但是在日本，情况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宣扬平等的天主教义，一方面是强调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和与此适应的社会结构，结果是两者发生冲突。

当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和政治统治、阶级利益交织在一起时，它就更加转变为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它和在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忠孝伦理直接对垒时，统治者就明显地感受到统治基础动摇的危险。本来，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等人都是为了与欧洲各国贸易通商换取物资和武器弹药才默许了天主教传播的，所以随着统治体制完善和与荷兰等国贸易的发展，他们先后提出了“禁教”的政策，驱逐外国传教士，强迫教徒改宗，严厉地